

#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广义政治经济学阐释\*

向国成 刘晶晶 杨雨煊

**摘要：**中国经济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相统一原则，对其进行理论阐释既是政治要求，也是更高的科学要求。本文在厘清分工范畴基本问题基础上，提出了以劳动为起点范畴，以劳动分工为中心范畴，以生产方式演化亦即劳动分工组织演化为纲的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阐明了这一逻辑主线从高度抽象生产方式到相对具体生产方式，再到个别具体生产方式的三层解析逻辑。其中，相对具体生产方式即劳动分工生产方式的发展内生了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一般机制；个别具体生产方式导致这一经济发展一般机制在不同社会形态中呈现特殊的经济运行与发展格局。本文沿着从生产方式到经济发展一般机制，再到经济运行与发展格局的演化主线，运用主要矛盾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进行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阐释。经济上“组织起来”主要是马克思论述的团队化分工组织和市场化分工组织发展及其相互促进。“组织起来”（即其中的团队化分工组织发展）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动机，是历史逻辑起点，劳动分工是阐释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理论逻辑起点，两者具有同一性，从而实现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在起点上的统一。“组织起来”即“两类分工”发展及其相互促进又内生出了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最完整论述的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一般机制，推进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高速度与高质量发展。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范式能够

[作者简介] 向国成，湖南工商大学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经济与贸易学院，邮政编码：410205，电子信箱：466125939@qq.com；刘晶晶（通讯作者），湖南工商大学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邮政编码：410205，电子信箱：674277196@qq.com；杨雨煊，湖南工商大学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经济与贸易学院，邮政编码：410205，电子信箱：y1243998332@163.com。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与市场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批准号：22&ZD051）的阶段性成果。衷心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刘伟教授给予的指导与鼓励，衷心感谢对本文提出建设性修改意见的匿名评审专家。文责自负。

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进行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相统一的阐释，组织起来既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动机，又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实现机制，中国共产党始终是组织起来的核心力量。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 经济组织化 中国经济现代化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在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我国是唯一在10亿级人口规模基础上完成工业革命并形成体系化工业能力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习近平，2021：223—224）。这击碎了一些人基于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的“中国崩溃论”预言。中国经济现代化成就不仅令人“迷惑”，更令人着迷，以至于说“谁能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谁就具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资格”。<sup>①</sup>于是，基于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统一，解析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中国经济现代化“密码”，就成为理论界的重大问题。

## 一、文献评述

中国经济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学术方位来看，对中国经济现代化之“谜”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是回答后发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已经存在先进发达国家条件下如何才能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张培刚、张建华，2009：ii）。这里对一些代表性经济理论阐释进行评述。

### （一）古典经济学面临发挥有为政府作用的难题

对于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了基于市场范围（规模）的劳动分工原理。后来，阿林·杨格（Allyn Young）对斯密的劳动分工原理做了新表述，指出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Young，1928）。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也认为“新世界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希克斯，1987：28），即市场扩展推动了工业革命。Desmet and Parente（2012）基于斯

<sup>①</sup> 《以改革开放的姿态与时代同行——写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2018年12月21日。

密的“分工受制于市场范围”（斯密，1972：16）思想，提出市场规模促进企业规模，企业规模促进创新的经济发展机制。文一认为自1860年以来，中国工业化经历的洋务运动、民国工业化等都是失败的，只有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是成功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道路其实与两百多年前的英国工业革命遵循相同的内在逻辑”（文一，2016：17）。他主张回到斯密基于市场规模的劳动分工原理来解释中国工业化与现代化，并强调在经济发展战略上选择正确的产业发展秩序（即从农业到轻工业，再到重工业）。概言之，“真正的关键因素是循序渐进的制造业结构提升和对相关工业品市场的培育、开拓和创造”（文一，2016：60）。

Desmet and Parente（2012）从市场规模到企业规模、再到创新来解释英国工业革命的逻辑并不具有普适性。一是早期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规模是通过对外殖民与扩张形成的，这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后发国家并不适用，这些国家面临如何内生市场规模的问题。二是根据张永生（2003）的研究，市场规模可以促进专业化与分工发展，但不一定促进企业规模，他由此提出了企业规模与市场规模无关论。三是从技术创新史来看，许多技术创新并不以企业规模为前提，只是成功的技术创新一定以市场规模为基础。因此，文一的上述解释，只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成就，而没有看到中国经济现代化成就是70多年累积发展的结果，没有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在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上统一起来。

上述古典经济学的阐释都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自发作用，而忽视政府作用。实际上，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认为，正是在分工发展中产生了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而“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形式”（马克思、恩格斯，2018a：29），<sup>①</sup>于是就有了政府。政府是共同利益的代表，是人类社会分工发展的重要组织成果。政府需要通过提供良好的正义秩序、发展战略以及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体制政策来发挥重要作用（向国成、刘晶晶、罗曼怡，2021）。文一一方面主张回归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传统，另一方面又认为古典经济学“忽视了

① 在恩格斯（2018c）中可以看到，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交换的剩余产品增加，促进了分工发展，也促进了家庭、私有制、国家的产生与发展。

创造市场的巨大社会成本，国家意志和政府创造市场中的关键作用，和‘市场本身是一种最基本的公共产品’这一根本原理”（文一，2016：15）。由此可见，古典经济学面临着如何发挥有为政府作用的难题，不能完整地阐释中国经济现代化历程。

## （二）新古典增长理论容易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论证

对于英国如何跳出马尔萨斯陷阱、走上工业革命道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新古典增长理论（Solow, 1957）主要分析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强调人均产出的增长来源于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和技术进步。Hanson and Prescott（2002）研究了外生的技术进步越过某临界点时，技术组合将从马尔萨斯停滞（在技术上是资本、劳动与土地组合）转向索洛式（在技术上是资本与劳动组合）现代经济增长。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的，实际上不能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真正来源。为了克服这一缺陷，Schultz（1961）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Arrow（1962）研究了边干边学的经济发展意义，Romer（1986）、Lucas（1988）用收益递增、知识溢出解释经济增长。

固然，现代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获得现代生产要素。例如，工业发展离不开农业在人力、资本、原料、消费品等方面的支持，进而需要改造传统农业。那么，如何改造传统农业？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认为仅仅局限于传统农业内部现存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对传统农业是徒劳的，“增加一些用于灌溉的水井和沟渠，一些用于耕作的牲口和工具，或农民已经用了几代的其他形式的物质资本，对农业产量的增加帮助甚微”（舒尔茨，2001：50）。因此，他认为需要从农业外部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如化肥、机器、农药等，以及投资人力资本。然而，化肥、机器、农药等现代生产要素不过是工业化的结果。这样，工业发展需要农业为其做出贡献，而改造传统农业又依赖工业发展的“产物”，就很容易陷入“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循环论证之中。到底如何获得现代生产要素并不清楚。

如果用新古典增长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现代化，就会发现中国经济现代化起步时“一穷二白”，哪有什么现代生产要素？！现代生产要素并不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动机。再者，尽管生产要素可以反映一定阶段的生产力

水平，但在它们被组织起来之前，都只是可能的生产力，只有组织起来的生产要素才能产生现实的生产力。而“生产要素贡献”并不能反映组织起来的作用。因此，仅仅从现代生产要素及其贡献出发来解释中国工业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理论，不足以令人信服。

### （三）新制度经济学忽视了现代制度本身是工业化产物的历史事实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是西方世界兴起的重要因素。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认为对历史中经济实绩的状态、发展方向和速度的解释需要人口变迁理论、知识存量增长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诺思，1994；诺思、托马斯，1999）。他认为无论人口压力的缓解，还是知识存量变化的方向和速率，都受制于一定的制度结构。在由知识和技术所规定的活动上限内，人类如何取得成功，不取决于知识和技术存量本身，而是“政治和经济组织结构决定着一个经济的实绩及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增长率”，“人类组织的成功或失败决定着社会是进步还是倒退”（诺思，1994：5），重点是私有产权、国家与意识形态。按照 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包容性制度和榨取性制度的二分法，包容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2018a：17）。“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2018a：16），是生产力与分工发展决定并促进社会关系（包括社会结构和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也就是说，制度对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作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而不是相反。文一（2016：3—4）也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忽视了制度和法律在人类历史上由生产方式推动的内生性演化……他们忽视了一个根本事实：普选民主是工业革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现代西方法律制度与实施它们的巨大组织动员能力是西方几百年基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重商主义、奴隶贩卖和带血的原始积累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产物”。正如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指出的，“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并不像人们通常描绘的那样，是一个自由、精干、有着可靠且不偏不私的机构的国家。相反，英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拥有

巨大的军费开支，几乎持续处于战争状态，有着强大且持干涉主义的官僚体制，税负高，政府债台高筑，实施保护主义关税，而且并不民主”（贝克特，2019：6）。

新制度经济学不能解释19世纪中后期德国和俄国在非包容性制度下的迅速崛起，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休克疗法”经济改革的失败，甚至不能解释为什么17—18世纪的荷兰比英国拥有更自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却无法开启工业革命。（文一，2016：3—4）他们用新制度经济学来衡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那就是所谓的威权体制。在他们看来，这种制度是不可能在一国取得工业化的成功与经济的长期繁荣的。然而，中国的发展事实却正好相反，而遵循以自由主义为圭臬的“华盛顿共识”的一些国家如拉美诸国，并没有迎来期待中的长期繁荣。

#### （四）结构主义赶超理论面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普遍失效的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相继取得政治独立，如何快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这些国家面临的重要课题。Rosenstein-Rodan（1943）认为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中心力量，基于资本、储蓄、需求的不可分性，提出了各行各业平衡发展的大推进理论。对此，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批判，认为落后国家难以解决推行平衡型发展战略所需的巨额资金，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赫希曼，1991），华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提出了主导部门理论（罗斯托，2021），都主张把国内的有限资源配置到带动能力强、投资收益大的领域。Prebisch（1950）、Singer（1950）分别提出了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的“中心—外围”理论，为了解决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进行贸易时的贸易条件长期恶化问题，他们都主张发展中国家必须走内向型发展道路，通过一些保护手段和激励措施，优先发展那些国外有较大进口需求的工业产品，实行进口替代型的发展战略，推进本国工业化。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基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德国、意大利、俄罗斯和保加利亚等国工业化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后发优势理论（格申克龙，2012）。他指出，由于工业规模和技术复杂性的持续增长，后发国家的工业化需要依赖中央政府的帮助和强大的制度工具，推行适合本国社会经济环境的财税、金融与外贸政策，利用后发优势进行工业革命。

二战后的赶超理论普遍强调经济结构的重要性，被统称为结构主义理论。结构主义理论的共同特点是都主张发挥政府作用，普遍忽视市场作用，不完全遵循甚至否定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原则。从二战后民族独立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在一国推行赶超战略的初期，一般能够取得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在推行一段时间之后，经济发展战略就会失效。到20世纪80年代，实行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等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放弃了赶超战略。结构主义赶超理论也解释不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过程。

### （五）禀赋比较优势及其产业发展顺序理论面临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统一的难题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对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解释是基于禀赋比较优势理论及相应的经济发展战略与体制政策，认为改革开放前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违背了我国当时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短缺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格局，因此，不得不依靠中央计划扭曲要素价格为重工业发展提供廉价资源，不得不依靠统购统销集中全社会资源支持重工业发展，不得不以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人民公社）作为微观基础来支撑重工业发展，由此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上，林毅夫（2012）进一步把自己的理论称为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国经济发展战略应与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从一般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在初始期，一国劳动力相对丰裕，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资本积累，再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通过知识创新，再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经济发展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逐步依次转型升级。类似的理论主张，如樊纲（2019，2020），提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的悖论”：发展中国家处处落后，处处不如人，但还要比发达国家增长得更快。他主张根据不同阶段利用好“发展要素”（比较优势、后发优势与本土优势），用好相对优势：第一阶段，纯粹依靠比较优势，挣得“第一桶金”，从而可以更多地投资于基础设施和教育；第二阶段，进入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同时起作用的时期，对外开放，学习模仿，主动地受益于“知识外溢”；第三阶段，继续学习模仿，发挥后发优势，同时加大自主创新力度。

禀赋比较优势及其产业发展顺序理论与前述古典经济学一样，都不能把我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在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上统一起来。实际上，用

比较优势理论否定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缺乏国家间能够交换这一基本历史前提条件；用产业发展顺序否定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完全忽视了国家面临的发展和统筹问题。本文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首先面对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全面封锁，到了20世纪60年代，又面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封锁，国家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在中国被封锁的情况下，不能与其他国家进行广泛的市场交换，怎么可能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去参与国际分工?! 分工要以能够交换为前提。在国家安全受到极大威胁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去按所谓的产业顺序去发展?! 只能是国内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优先需要什么，就优先发展什么。

从经济发展战略选择来看，要素禀赋结构固然是影响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但最根本的依据则应是社会主要矛盾（向国成、湛亭颖、刘晶晶，2019）。如果完全按照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做，就只有一种战略可能性，应该放弃哪怕暂时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产业，那么，今日之中国是否应该发展芯片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一个问题。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现代化历程，既包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也包括已经走过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针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指出：“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习近平，2014：22—2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习近平，2017a：36）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道路亦是如此！在“两个历史时期不能相互否定”基础上，进一步按“三大逻辑统一”原则阐释中国经济现代化既是政治要求，也是更高的科学要求。

中国经济现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的，唯有立足于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才有可能揭开“谜底”。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有更强包容性、更广泛共识的分析范畴，或许对解决这一问题有所裨益。对于分析范畴的挖掘，需要回到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寻找，回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上去领悟其中的奥妙！历史逻辑起点在哪里，理论逻辑起点就在哪里。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程，“组织起来”贯穿始终。只是还需要对“组织起来”进



行更为深入的理论化工作。在文一（2016）的研究中，组织起来也是非常本质的重要内容，本文与他的不同在于：他运用斯密基于市场规模的劳动分工原理，本文将基于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范式，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与市场、计划思想和主要矛盾分析方法。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明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确立中国经济现代化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起点范畴；第三部分阐明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三层解析逻辑，确立阐释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演化主线；第四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范式下，阐明组织起来既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动机，又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实现机制；第五部分是结语。

## 二、在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内 确立起点范畴

### （一）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逻辑主线

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恩格斯，2018a：155），是“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恩格斯，2018a：158—159）。广义政治经济学要在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基础上，“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恩格斯，2018a：156）。尽管“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恩格斯，2018a：159），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已经包含了丰富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需要进一步挖掘、梳理、提炼与创新。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对广义政治经济学没有像《资本论》那样，明确提出一条由起点范畴（商品）和中心范畴（剩余价值）等构建出来的逻辑主线，但是，他们阐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这一最抽象、最基本的分析范式。这一总范式包含了一条以劳动为起点范畴，以

劳动分工为中心范畴，以生产方式演化即劳动分工组织演化为纲的逻辑主线。<sup>①</sup>（1）劳动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恩格斯（2018b：303）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价值。劳动是人类发展的历史起点，因而可以成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起点。林岗（2007：32）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劳动这个范畴出发来开始自己逻辑进程的。”（2）劳动分工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范畴。恩格斯指出，关于整个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马克思、恩格斯，2012b：609）；马克思说：“第二类分工从某一方面来看，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马克思、恩格斯，1998b：304）。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两个思想衔接统一起来，实际上就提供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范畴，即劳动分工。有了分工，才有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其他范畴。（3）劳动分工组织演进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演化主线。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划分，根本依据是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的核心问题是与一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决定的劳动分工组织。原始社会生产方式以生产资料原始公有制为基础组织共同体内劳动分工，奴隶制生产方式以奴隶主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包括奴隶在内）为基础组织劳动分工，封建制生产方式以封建地主占有基本生产资料土地和不完全地占有直接生产者农奴和农民为基础组织劳动分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组织劳动分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组织劳动分工，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劳动分工。因此，如果在抽象意义上，把生产方式演化作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是成立的，那么，在具体意义上，把劳动分工组织演化作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也是成立的。

所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存在一条以劳动为起点范畴，以劳动分工为中心范畴，以生产方式演化亦即劳动分工组织演化

---

<sup>①</sup> 刘伟（2022）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是不断从狭义发展至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以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及其运动为考察对象，进而揭示人类社会生产方式演进的历史规律和趋势。这坚定了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的想法。谢富胜（2023：112）提出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综合框架。

为纲的逻辑主线。<sup>①</sup> 如果进一步挖掘与梳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分工范畴的一些基本问题，将更有利于理解与把握这一逻辑主线。

## （二）关于分工范畴一些基本问题的挖掘与梳理<sup>②</sup>

1. 分工内涵：作为一切特殊的生产活动方式的总体，是社会劳动的总体形态。理论界对于分工内涵的界定多为直观描述。一种流行较广的说法是劳动分工指各种社会劳动的划分和独立化，也就是把分工等同于专业化或专门化。这实际上是从个体视角来看分工。杨小凯（1998：49）指出，分工与专业化有联系，但也有区别，分工是一种生产结构。通过思想比较，本文发现还是马克思对分工内涵的界定是迄今最为科学的。马克思说：“分工作为一切特殊的生产活动方式的总体，是从物质方面、作为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来考察的社会劳动的总体形态。”（马克思、恩格斯，1998a：445）也就是说，首先应该从社会总体视角来理解分工内涵。分工作为一切特殊的生产活动方式的总体，是社会劳动的总体形态。这可以作为马克思对分工内涵进行界定的总定义。

2. 分工构成：专业多样化、劳动专业化、生产迂回化和经济组织化的统一。马克思在其著作中，针对不同情景，对分工还有一些“分定义”，可以解读为分工的内在构成或结构，即“社会劳动的总体形态”的内在构成。向国成、刘晶晶、罗曼怡（2021）把它总结为专业多样化、劳动专业化、生产迂回化和经济组织化的统一。其中，劳动专业化、生产迂回化和专业多样化大致代表生产力方面的具体化，经济组织化则代表生产关系方面的具体化。

3. 分工属性：生产方式的一种具体的“总体形态”，一种具体的生产方式。由于分工是“社会劳动的总体形态”，就不能只把它看作生产力的范畴，或生产关系的范畴，或两者的中介环节（秦庆武，1983），而应视为生产力与

① 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系统性代表成果，有许涤新（1954a，1954b，1954c）、姚开建（2019）等，尽管他们都研究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及其演化，但没有明确提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存在的这条逻辑主线。本文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

② 这里的一些问题已经在笔者发表的相关论文中得到了回答，之所以还要在这里进行简约而系统化的呈现，是因为回答这些问题既是更好理解和把握逻辑主线的需要，也是本文将要提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中三层解析逻辑的前提，这样才能体现论述的完整性。

生产关系相统一的“总体形态”（向国成、刘晶晶、罗曼怡，2021）。而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因此，分工是一种具体的生产方式，是生产方式的一种具体的“总体形态”。与之对应，自给自足是生产方式的另一种具体的“总体形态”。一旦在属性上把分工界定为具体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演化在具体意义上就是劳动分工组织的演化，即使劳动分工向自给自足退化，也是其演进的一种可能方向。因此，把生产方式演化作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实际上也就是把劳动分工组织演化作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

4. 分工类型：第一类分工即市场化分工与第二类分工即团队化分工。理论界习惯于用社会分工与企业内分工表述“两类分工”，这并不严谨。尽管这可以从马克思那里找到文字表述的依据，但从内涵实质来看，根据向国成、刘晶晶、罗曼怡（2021）的研究，马克思讲的第一类分工由于通行市场调节机制，因而是市场化分工；第二类分工通行非市场调节机制，如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计划制度等，也就是通行计划调节机制，包括原始共同体内分工、公社内分工、家庭内分工、作坊内分工、工厂内分工、企业内分工，甚至自由人联合体内分工等，因而统称为团队化分工。也就是说，社会分工从协调机制上可划分为市场化分工和团队化分工。

市场化分工和团队化分工相互促进。马克思认为“分工导致了进一步的分工”，结果是“那种通过商品交换互相补充成整个生产、并通过竞争和供求规律对这种生产的各个代表发生作用的社会内部的分工（即市场化分工——笔者注），会同那种标志资本主义生产特征、完全消灭工人的独立性并使工人变成资本指挥下的一个社会机构的部件的工厂内部的分工（即团队化分工的一种——笔者注），并行不悖地一起向前发展”（马克思、恩格斯，1998b：308—309）。“社会内部的自由的、似乎是偶然的、不能控制的和听凭商品生产者的任意行动的分工（即市场化分工——笔者注）同工厂内部的系统的、有计划的、有规则的、在资本的指挥下进行的分工（即团队化分工的一种——笔者注）是一致的，而且这两种分工是齐头并进地向前发展的，通过相互作用而相互产生。”（马克思、恩格斯，1998b：360）

5. 分工依据：分工与比较优势的辩证关系。一个经济主体（包括个人、企业甚至国家）生产什么、谁来生产、在哪里生产等构成分工格局。那么，分工的依据是什么？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包含了这一问题的答案。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素禀赋在人类社

会的很长历史时期都对一个社会和国家生产什么、在哪里生产、谁来生产等分工格局起着主导作用。“自然分工发生在交换之前，……这种分工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以人本身自然差别为基础，而且以各个共同体所拥有的生产的自然因素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1998b：312）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自然分工延续了很长时间，今天仍有它的身影。因此，要素禀赋在人类社会的很长历史时期都对分工格局起着主导作用。

从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能动性与实践性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2012a：274、138）认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随着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创新促进分工，分工促进创新。“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马克思、恩格斯，2012a：246）自然科学“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马克思、恩格斯，2018a：60）。这就意味着一国生产什么、怎样生产、谁来生产，可以通过发挥人类社会认识与改造世界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在相当程度上使劳动分工超越现有要素禀赋的制约。与斯密相比，马克思（2018a：378）指出，分工“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马克思强调分工组织所产生的集体力正是内生比较优势的重要源泉。因此，分工改变比较优势格局。

禀赋比较优势制约分工格局，而分工也改变比较优势格局，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分工与比较优势的辩证关系思想（向国成、刘晶晶，2020）。这一重要思想意味着在分工与贸易问题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定理”，<sup>①</sup> 一国生产什么取决于社会主要矛盾、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内外部条件。

6. 分工趋势：从以人的依附到以物的依附，再到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发展趋势。从人类社会历史来看，原始社会是一个以原始公有制（或共有

---

① 杨小凯和张永生提出“贸易不可能定理”，即“一般均衡是技术、禀赋、偏好、交易效率等多个参数经由价格、数量之间无数反馈圈形成，根本找不出普适的规律”，“有关的贸易量、价格及资源禀赋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有什么一般规律，一些特定规律只在特定模型的特定参数范围内成立”。对此，向国成、韩绍凤用“综合比较优势”来概括。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与比较优势辩证关系思想是一致的。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与比较优势辩证关系思想是“综合比较优势”与“贸易不可能定理”的经济哲学基础。参见杨小凯和张永生（2001）、向国成和韩绍凤（2005）。

制)为基础的团队化分工组织,这是人类社会分工发展的历史起点;当原始部落开始接触交换时,市场化分工得到发展,同时扩大了社会范围进而也扩大了社会分工的范围;原始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和市场化分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以原始公有制(或共有制)为基础的团队化分工组织,而私有制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团队化分工组织逐步发展;现代社会形成了既有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团队化分工组织,也有以非公有制为基础的团队化分工组织,还有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团队化分工组织,同时市场化分工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形成以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自由人联合体。这样,整个人类社会,从原始的第二类分工组织出发,经过两类分工组织的高度发展与相互促进,最终达到更高层次的第二类分工组织。在那里,消灭了商品,消灭了自发的、异己的劳动分工。如果说还存在劳动分工,也是自觉的、自主的、自由的劳动分工,是劳动分工充分发展的最高表现形式(向国成、刘晶晶、罗曼怡,2021)。

概括来说,人类劳动分工从以对人的依附为基础的分工,到对以物的依附为基础的分工,再到自由人联合体的分工发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的人类社会分工发展的历史大趋势。本文提出的广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与这一历史大趋势相吻合,后者正是对前者的印证。

7. 分工地位:第二类分工才是政治经济学一切范畴的范畴。马克思说:“第二类分工从某一方面来看,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只把它当作资本的特殊的生产力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1998b:304)向国成、刘晶晶、罗曼怡(2021)根据《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分工演化历史指出,“某一方面”是指生产关系方面,马克思的话就可以转述为“尽管这里只把第二类分工当作资本的特殊的生产力来考察,但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它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由于第二类分工即团队化分工组织早于市场化分工组织,是分工的历史起点,从原始共同体内分工、公社内分工、家庭内分工,到作坊内分工、工场内分工、企业内分工,更能反映生产方式及与之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变革,更能反映特定生产方式及与之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特殊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正是通过解剖第二类分工中工场内分工和企业内分工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而揭示了剩余价值的全部秘密。所以,从历史发展来看,第二类分工才是政治经济学一切范畴的范畴。

### （三）组织起来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起点，相应的劳动分工是理论逻辑起点

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可以把劳动作为起点范畴，而狭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个别阶段、个别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特殊规律的，由于历史发展阶段与起点不同，其理论逻辑起点就会不同。如《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劳动分工经过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商品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从而可以把商品作为理论逻辑的起点范畴，分工则是前置范畴。研究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也属于狭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但并不能把商品作为理论逻辑的起点范畴。因为，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中国经济现代化起步的时候还主要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劳动分工与商品经济还没有得到广泛发展。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孙中山先生曾试图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但真正完成这一任务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1996b：348）指出：“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也就是说，组织起来开展“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马克思、恩格斯，1979：380），<sup>①</sup>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组织起来”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起点。

在经济上，“组织起来”的学术化表述是经济组织化，是相对于分散的、缺乏联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言的（向国成、韩绍凤，2007）。经济组织化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组织的团队化，如企业、合作社、政府等科层组织的发展，即团队化分工组织发展；二是组织的市场化，如通过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建立起来的买卖关系，即市场化分工组织发展。经济上“组织起来”正是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两类分工”组织发展，两者具有同一性。

因此，如果“组织起来”作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起点能够成立，那么，把劳动分工作为阐释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理论逻辑起点自然成立，从而

① 基于人口规模及其能动性，实现“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以提高劳动生产力，进而创造新的生产力与内生比较优势，这是马克思的重要分工思想。参见向国成、刘晶晶（2020）。

在分析中国经济现代化时就可以实现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在起点上的统一。这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内选择阐释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起点范畴。

### 三、在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层次内 确立演化主线

如果以生产方式演化为纲作为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还需要进一步解析这一逻辑主线的层次，从而在相应的逻辑层次内选择阐释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演化主线。

(一) 第一层次，在高度抽象的生产方式上：狭义生产方式是直接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及劳动方式，静态看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动态看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广义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生产方式的演化

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三者关系最为普遍的认识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切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马家驹和蔺子荣（1980）、吴易风（1997）根据马克思“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2009：602）等论述，认为生产力不是直接决定生产关系，而是通过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提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存在“生产力 - 生产方式 - 生产关系”的分析范式。孟捷（2016）不同意这种把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与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对立起来的观点。这两种观点都可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找到依据，需要把它们统一起来。否则，就破坏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性。本文赞同从狭义与广义、静态与动态上统一这两种观点，见图1。

1. 狭义生产方式和广义生产方式。狭义生产方式是指以一定的技术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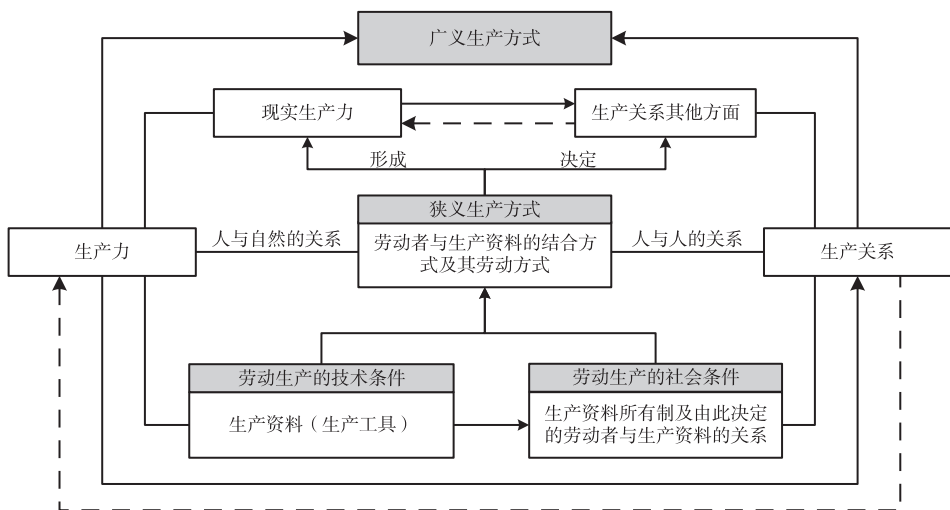


图1 广义生产方式与狭义生产方式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注：实线代表起决定作用及其方向，虚线代表起反作用及其方向。

和社会条件为基础形成的、占社会主导地位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及其劳动方式，是直接生产过程中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和为谁生产的总和。

(1) 生产方式取决于直接生产过程的技术条件，即生产资料尤其是生产工具及其技术特征。马克思（2018a：366）在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论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指出，“他的劳动生产条件，也就是他的生产方式”；“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马克思和恩格斯（2018b：12）。对这一点早有更为一般性的论述：“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在物质条件中，尤为重要是劳动资料，以至于马克思（2018a：210）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

(2) 生产方式取决于直接生产过程的社会条件。最为根本的社会条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例如,在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中,“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农奴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 and 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马克思,2018a:822)。马克思指出:“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马克思,2018a:821)这种生产条件的分配,“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马克思,2018c:16)。因此,生产方式须臾也离不开生产资料所有制,一切生产方式都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而展开。

(3) 技术条件推动社会条件的发展变化。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2012a:222)生产工具等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马克思,2018a:210)。马克思和恩格斯(2018b:49—50)中指出:“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以生产工具为出发点,这里已经表明,对于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来说,私有制是必要的。在采掘工业中私有制和劳动还是完全一致的;在小工业以及到目前为止的整个农业中,所有制是现存生产工具的必然结果;在大工业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是大工业的产物,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因此,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由此可见,生产工具及相应的生产力水平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可以说,作为社会经济关系之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尤其是生产工具的发展结果。

(4)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及其劳动方式决定现实生产力,再生产社会条件 and 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共同决定直接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及其劳动方式。在一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及其劳动方式中,总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人与人的经济社会关系这两个方面的统一。一定的人与物的关系需要有一定的人与人的关系与之相适应,只有在一定的人与人的关系中才能真正产生一定的人与物的关系,并形成现实生产力。“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

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2012a：340）即使是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2018a：25）。由于生产方式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相联系，离开了“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就只剩下生产力要素，并不产生现实生产力。只有通过“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把生产力要素的人和物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现实生产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及其劳动方式和现实生产力一道再生产出生产资料所有制等社会条件，并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如交换、分配、消费等。

根据上述狭义生产方式的内容来看，一方面，从静态来看，狭义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它包含了代表生产力的技术条件和代表生产关系的社会条件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包含了在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关系，包含了初次分配关系等。它是直接生产过程中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和为谁生产的总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另一方面，从动态来看，即从“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恩格斯，2018a：20）来看，狭义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即“生产力——狭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它既以现存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并产生新的现实生产力，又和新的现实生产力一道，既可能把原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更大规模上再生产出来，并决定交换、分配、消费等生产关系，也可能产生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并决定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等生产关系。

至于广义生产方式，理论界的认识基本一致，包括：狭义生产方式，与狭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其他方面，与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前两者共同构成社会经济结构。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社会经济形态。广义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

2.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对矛盾是推动生产方式变革的动力。平心（1959）、董辅初（1980）、卫兴华（2014）等认为动力来自生产力内部的矛盾，如生产工具与劳动力、生产工具与劳动对象、生产工具与生产工具的矛盾。张闻天（1979）从生产关系内部寻找矛盾与动力，把生产关系划分为两类：一是“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如按技术要求形成的劳动分工与协作关系，这是“生产关系一般”；二是“特殊的生产关系”，即一定社会形态中的生产资料和生产产品的所有关系，“生产关系一般”存在于“特殊的生产关系”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不是外在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是内在于生产关系的矛盾”，即表现为这两类生产关系的矛盾。孟捷（2016）在“有机生产方式”论中认为生产关系具有适应或促进生产力发展、帮助统治者榨取更多的剩余的双重功能，这双重功能是否存在矛盾，取决于生产型生产关系还是榨取型生产关系，他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以外的因素决定生产关系，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统一起来，从生产力系统、阶级斗争和国家间竞争来解释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迁。

本文认为，上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的诸多矛盾可以进一步统一为个体生存发展能力绝对增强（相应的个体化行动增强）与个体生存发展能力相对不足（相应的集体化行动增强）的矛盾，并通过这一矛盾的权衡来选择生产方式与经济组织形式。恩格斯（2018c：35）指出：“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这句话蕴含了一个普遍性矛盾：一方面，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个体生存发展能力在绝对增强，从而个体化行动也不断增强；另一方面，相对于竞争性的自然与社会关系而言，个体生存发展能力又总是相对不足，需要集体化行动来弥补。这样就产生了个体化行动与集体化行动的矛盾。<sup>①</sup>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在人类早期，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面临的外部自然与社会环境极其危险，单靠个体力

<sup>①</sup> 这里，本文对个体化行动与集体化行动给出初步界定：从原来的集体出发，个体获得越来越强的独立性、越来越大的自主性、越来越多的自由决策权利，称之为个体化行动；从原来的个体出发，个体融入某种集体关系之中，越来越丧失独立性、自主性和自由决策权利，称之为集体化行动。

量难以生存与发展，需要“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集体行动的规模和力量首先取决于人口规模。人口规模越大，集体行动的规模和力量可能就越大，有利于提高狩猎大型动物、改造农田水利等农牧业生产效率，增强应对外部环境风险的能力。因此，扩大人口规模是人类早期社会的重要目标。为了扩大原始共同体的人口规模，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从而生活资料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集体行动的劳动果实尽可能做到“人人有份”，“相当平等地分配”（恩格斯，2018a：156），以维持共同体内每个人的生存，<sup>①</sup>这就形成了人类早期的公有制形式，如原始共有制、部落所有制和古代公社所有制等，以及相应的社会经济关系。恩格斯（2018a：156）指出：“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这种公社一起或带着它的非常明显的残余进入历史的。”随着人类在生产力上掌握获取火、制造弓箭等生产工具的技术，个体生存发展能力绝对增强，过去由“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才能完成的任务，后来个人和家庭也能完成，例如从集体狩猎到个体狩猎。人类从群婚制到氏族社会，再到家庭，呈现个体化行动发展的轨迹。私有制是个体化行动的结果，其动力正是新生产力的获得及个体生存发展能力的绝对增强。以中国上古时期的耦耕（即两人一起进行翻土的耕作）为例，它历经夏商西周直至战国才最终衰落。它是伴随黄河流域原始沟洫农业的发展而出现的。为了翻土的需要，翻土工具即耒耜也应运而生，两个人并作是最合适的形式。耦耕与井田制、村社制度构成“三位一体”的生产关系。到了战国时代，新生产力即牛耕和铁制工具的发展，为个体家庭开展独立经营提供了便利，独立的自耕农经济得以发展，以井田制和村社制度为核心的领主封建制随之衰落。<sup>②</sup>但是，由于个体生存发展能力又总是相对不足的，从氏族公社到民族国家，再到文明国家，又呈现集体化行动发展的轨迹。国家是基于共同利益的“群的联合和集体行动”的产物，是支撑集体化行动的一种制度选择，而国家为了实施保障共同利益的集体化行动，需要所有制、税收、货币等方面的支持。其中，公有制是支撑集体化行

①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前小土地所有制和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中，“各个个人都不是把自己当作劳动者，而是把自己当作所有者和同时也进行劳动的共同体成员。这种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虽然他们也可能从事剩余劳动，以便为自己换取他人的产品，即剩余产品，——相反，他们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马克思、恩格斯，1995：466）。

② 参见李根蟠（1983）、陈振中（2007）。

动的一种制度选择。

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矛盾相适应，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与具体环境下，存在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sup>①</sup> 社会主要矛盾将决定个体化行动与集体化行动的矛盾张力，这种矛盾张力内生出不同的所有制结构与经济组织形式，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即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个体化行动与集体化行动的矛盾——生产方式演化的路径。当然，归根到底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

（二）第二层次，在相对具体的生产方式上：劳动分工与自给自足，形成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的经济发展一般机制

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逻辑，对高度抽象的生产方式进行具体化。本文按相对具体、个别具体两个层次进行。

1. 对分工属性的进一步界定。劳动分工，一方面，以一定生产力水平和所有制形式为基础，同时又促进了所有制形式的发展。“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2018a：74），“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马克思、恩格斯，2018a：12—13），如从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到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等。因此，从动态来看，分工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即“生产力—狭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转化为“生产力—分工—生产关系”。<sup>②</sup> 另一方面，这些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反过来又决定分工中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2012a：148）。从静态来看，分工仍

① 谢富胜（2023：22）根据毛泽东同志等领导人的论述，认为：“以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分析方法为理论基础，用基本矛盾判断社会形态的性质，用主要矛盾判断社会发展阶段，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历史方位论。”这是本文借鉴运用的基本分析方法。

② 这里对分工属性作进一步界定。崔向阳认为，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构建了分工发展的宏大框架，包含“生产力—分工—生产关系”范式。但他没有阐明分工是一种相对具体生产方式的属性，只看到了分工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没有看到分工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参见崔向阳（2011）。

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因此，在相对具体的生产方式上，分工既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又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

2. 劳动分工与自给自足。在相对具体的生产方式上，可以划分为劳动分工与自给自足两种生产方式。从人类发展至今的历史来看，经历了团队化分工协作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团队化和市场化相互促进的分工协作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

在原始共同体时期，生产力水平及相应的个体生存发展能力极度低下，以生产资料原始公有制支撑原始共同体，在共同体内开展“自然分工”，即原始共同体内的团队化分工。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个体生存发展能力增强，家庭成为社会生活与生产的基本细胞，但社会的交易效率还很低，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得到发展。这是马克思说的“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2012a：147）。马克思针对法国小农状态指出：“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马克思、恩格斯，2012a：762）这种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广泛地存在于奴隶制、封建制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之中。马克思（2018a：388、872）指出：“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一部分构成封建制生产方式的基础，一部分在封建制生产方式瓦解以后又和资本主义生产并存。同时，它们在原始的东方公有制解体以后，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以前，还构成古典共同体在其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交易效率提高，扩大了社会范围和交往范围，商品经济发展，市场竞争加剧，“我们的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2020：595）。随着生产工具和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以各种类型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团队化分工组织蓬勃发展。

原始共同体内的团队化分工是分工的历史起点，市场化分工则是从两个相反的起点发展起来的。一个是在氏族、公社互相接触的地方产生的。“产品

作为商品的这种交换，起初是在各个共同体之间而不是在同一个共同体内部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1998b：312）另一个是公社瓦解。公社之间的交换成为瓦解公社本身的主要推动力。“在以生理分工为起点的地方，直接互相联系的整体各个特殊器官互相分开和分离，——这个分离过程的主要推动力是同其他共同体交换商品，——并且独立起来，以致不同的劳动的联系是以产品作为商品的交换为中介的。在一种场合，原来独立的东西丧失了独立（即不同公社之间建立起市场交换关系而丧失独立性——笔者注），在另一种场合，原来非独立的东西获得了独立（即公社内部的瓦解——笔者注）。”（马克思、恩格斯，2016：361）总之，彼此当作外人看待的关系，“在原始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并不存在，不管这种共同体的形式是家长制家庭，古代印度公社，还是印加国，等等。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2016：69—70）。从此，市场化分工得到了发展。

就历史发展趋势而言，一方面，从生产来看，劳动者越来越专门化，尽管他在某一专门化领域的个体生存发展能力绝对增强，但越来越成为产品生产的一个“器官”，需要团队化分工协作才能完成整个产品的生产。另一方面，从需求来看，通过自身生产直接满足个体多样化需要的个体生存发展能力更加相对不足，市场化分工协作成为满足个体多样化需要的必然选择。自原始共同体开始接触与交换以来，人类社会步入了团队化分工和市场化分工相互促进的漫长历史进程。

3. 形成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一般机制。如前所述，分工是“社会劳动的总体形态”，是专业多样化、劳动专业化、生产迂回化和经济组织化的统一，是一种相对具体的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方面的专业多样化、劳动专业化、生产迂回化决定生产关系方面的经济组织化发展；同时，专业多样化、劳动专业化、生产迂回化只有依存于一定经济组织形式才能产生现实的生产力，经济组织化制约着专业多样化、劳动专业化、生产迂回化的发展。分工中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与反作用，进一步形成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一般机制（如图2所示）。向国成、刘晶晶、罗曼怡（2021）追溯思想渊源，梳理发展脉络，从思想史上阐明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最早最完整地论述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之间循环累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思想，比斯密（1972）



更全面，比 Young（1928）更久远。<sup>①</sup>可以说，这是适用于自原始共同体接触以来的“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2014：155）。任何民族和国家，要想获得经济发展乃至实现经济现代化，都离不开这一经济发展一般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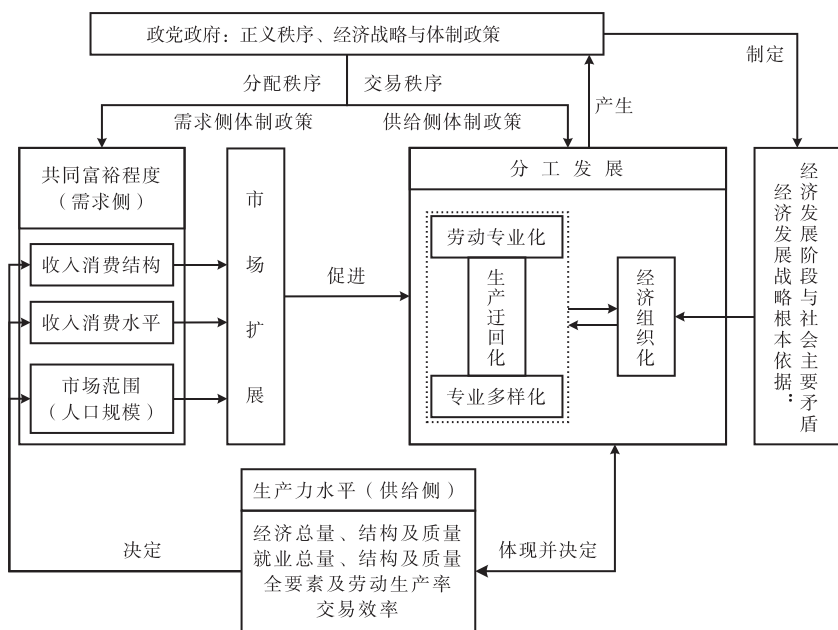


图2 基于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的经济发展一般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分工发展既体现生产力水平，又进一步决定生产力水平，形成生产力水平及供给侧，如经济总量结构及质量、就业总量结构及质量、全要素和劳动生产率、交易效率等；生产力水平及供给侧又决定人口规模、市场范围、收入消费水平、结构和质量等，亦即共同富裕程度；共同富裕程度决定市场规模及扩展程度，形成需求侧；市场扩展促进分工发展，分工发展促进生产力水平提高。这样，就形成一个经济发展循环累积的因果链条。作为经济组织化两个基本方面的团队化分工和市场化分工相互促进是内生市场规模的基本

<sup>①</sup> “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被冠之以“斯密-杨格定理”。这不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述的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之间循环累积的相互促进关系的另外一种表述而已。参见向国成、刘晶晶、罗曼怡（2021）。

机制（杨小凯，1998；谢富胜、李安，2009），从而在内生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一般机制中占据重要地位。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正是在分工发展中产生了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才产生阶级、政党与政府。这是经济组织化的重要内容。作为政党政府，需要制定经济发展战略、通过提供良好的交易秩序和分配秩序以及供给侧和需求侧体制政策在劳动分工发展的组织与协调中发挥重要作用。<sup>①</sup> 社会主要矛盾是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依据，而经济发展战略通过经济组织化影响劳动专业化、生产迂回化和专业多样化而进入这一经济发展的循环累积链条中。<sup>②</sup>

（三）第三层次，在个别具体的生产方式上：具体化的劳动分工组织方式，经济发展一般机制呈现特殊的经济运行与发展格局

这里进一步把相对具体的生产方式具体化，即对劳动分工生产方式具体化。劳动分工是一种相对具体的生产方式，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必须结合，而“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马克思，2018b：44）。由一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共同决定的劳动分工生产方式，可以更具体地划分为原始共同体生产方式、奴隶制生产方式、封建制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等，进而形成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

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的经济发展一般机制在个别具体的生产方式下呈现特殊的经济运行与发展格局，是一个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总和。

1. 原始社会生产方式。它是以生产资料原始公有制为基础的共同体内劳动分工组织形式，调节这种分工及经济运行的机制是血缘、宗教、习俗等非

---

① 周文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及国家利益观，认为国家是解释经济发展的关键机制。参见周文和包炜杰（2021：105）。杨虎涛和刘方（2019）认为强大的国家能力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基础。

② 这里接受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内生经济组织的思想（如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内生计划价格、统购统销和公有制微观基础）。但本文与他们的不同在于，他们把要素禀赋作为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根本依据，本文则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是决定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根本依据。参见向国成、谌亭颖、刘晶晶（2019）。

市场调节机制；根据共同体需要安排劳动分工，私人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每个成员不仅作为劳动者存在，还以共同体成员身份作为所有者存在；生产的目的在于直接获得产品使用价值，共同占有剩余产品，维持整个共同体的生存。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恩格斯提出的畜牧业和农业分离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以及手工业和农业分离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商业和其他产业分离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开始，“我们就看到，各不同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把交换作为一种经常制度来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恩格斯，2018c：178）。共同体之间的接触与交换是产品转化为商品进而产生货币的开始，是市场化分工的开始，是团队化分工和市场化分工相互促进的开始，是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的经济发展一般机制萌芽的开始。

2. 奴隶制生产方式和封建制生产方式。随着原始公有制的瓦解，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当一部分人（如战俘）成为另一部分人的私有财产的时候，奴隶制生产方式就随之诞生了，当地主占有基本生产资料土地和不完全占有直接生产者农奴或农民的时候，就产生了封建制生产方式。无论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奴隶制生产方式或封建制生产方式始终与小生产方式（典型形式是自己的劳动与自己私有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并存。一方面，作为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马克思，2018a：872）。另一方面，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奴隶制生产方式或封建制生产方式，通过组织劳动分工，促进了商品与货币经济的发展，加剧了市场竞争，加剧了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加剧了生产资料的集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马克思，2018a：873）。团队化分工生产方式与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经过漫长的竞争，以小生产方式破产而结束，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团队化分工和市场化分工体系之中，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一般机制不断成长。

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自由雇

佣劳动制度为基础的劳动分工组织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在阶级关系上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这种矛盾具有对抗性质，由此决定了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相互促进这一经济发展一般机制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与发展格局上呈现特殊性：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分工发展）与劳动者购买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即团队化内部分工的组织性与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即市场化分工的自发性与盲目性）的矛盾，导致经济发展不断被周期性经济危机所打断。

（四）演化主线的选择：从生产方式到经济发展一般机制、再到经济运行与发展格局的演化主线

上述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层次包括高度抽象生产方式、相对具体生产方式和个别具体生产方式三个层次，相对具体生产方式产生经济发展一般机制，个别具体生产方式决定经济运行与发展格局。因此，整体上，其逻辑层次是从生产方式到经济发展一般机制，再到经济运行与发展格局（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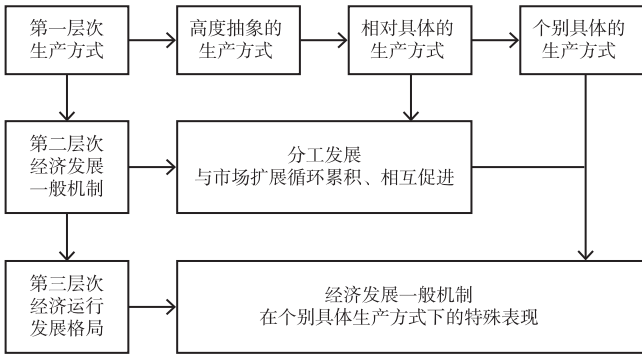


图3 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层次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中国经济现代化实现了经济的长期繁荣与长期稳定，这正是理论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下面按照从生产方式到经济发展一般机制，再到经济运行与发展格局的演化主线，运用主要矛盾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进行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阐释。

## 四、组织起来：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动机与实现机制

(一) 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在起点上统一：组织起来开展劳动分工，奠定团队化分工发展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1949—1956年）

1. 组织起来创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政治前提。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生产力水平低，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制度的盘剥。因此，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制下，个体生存发展能力无论在绝对意义上还是在相对意义上都严重不足，要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需要“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必须把人民群众广泛“组织起来”。毛泽东（1991a：13—14）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明确提出“组织起来”。<sup>①</sup>在1943年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毛泽东发表《组织起来》的演说，指出“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毛泽东，1991b：930—933）。在二十八年浴血奋斗中，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一切方针、策略与政策，都在于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组织起来，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开启中国经济现代化创立了政治前提。

2. 相对具体生产方式的选择：走团队化分工发展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新进程，在相对具体生产方式上，面临选择“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还是选择劳动分工生产方式的问题。毫无疑问，劳动分工生产方式是必由之路。也就是组织起来开展“劳动的更广泛

---

<sup>①</sup> “组织起来”既有政治与军事上的，也有经济上的，团队化分工组织是它们所共有的，但市场化分工组织则是人类社会一定阶段经济上所特有的。政治上“组织起来”有利于经济上“组织起来”，甚至是经济上“组织起来”的政治前提。正如毛泽东（1999c：132）指出的：“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虽然本文主要是阐述经济上“组织起来”，但是政治与军事上“组织起来”也是不可或缺的。

的分工和结合”。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毛泽东，1999a：457）“组织起来”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逻辑起点，与之对应的理论逻辑起点是劳动分工，具体讲是“第二类分工”，即团队化分工。这样，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在起点上就得到了统一。

3. 个别具体生产方式的选择：奠定团队化分工发展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团队化分工既可以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经济现代化应该如何选择？从世界历史经验来看，资本主义道路并不能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如果以20世纪40年代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束时间，无论是英国在千万级人口规模基础上，还是美国在亿级人口规模基础上完成第一、二次工业革命，都用了两百年左右的时间。而我国要在更大人口规模基础上完成第一、二次工业革命，如果选择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必定需要比美国和英国更长的时间。而且，用200年时间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人民肯定不会答应。当然，中国共产党自己更不会答应！现今世界百年大变局再次告诫我们，在已经存在发达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国家间竞争不会留给中华民族如此从容不迫的时间。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公有制经济，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到中叶，用3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以苏联为榜样，走社会主义道路，加快现代化发展速度，这是当时的基本共识。早在1944年，毛泽东同志指出：“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毛泽东，1996a：146）但是，中国经济现代化起步时的工业状态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现在我们能制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1999a：329）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那一代人，在中华民族衰落时，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民族复兴的心情十分迫切，急需找到一条快速的工业化与现代化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毛泽东，1999a：299）1950年，毛泽东同志访问苏联后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99）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就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威胁，个体生存发展能力无论从绝对意义还是相对意义来看，都严重不足，唯有通过集体化行动组织起来提高生存发展能力，才能真正“站起来”！<sup>①</sup>但从社会主要矛盾来看，在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落后的农业国里，要把人民群众快速广泛组织起来，开展“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面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与封建资产阶级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严重制约，即“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受到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矛盾的严重制约。<sup>②</sup>也就是说，走资本主义道路，依靠私有制的自发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但不能更快速、更广泛地组织起来开展“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因此，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个体化行动与集体化行动之间的矛盾张力没有多少回旋与调和的空间。可以说，在当时不堵住私有制的路，就迈不开中国工业化的步。<sup>③</sup>而要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2018b：49）。也就是说，国家政权加上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更快速、更广泛地组织起来开展“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用三年时间战胜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一系列严峻挑战，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为开展社会主义革

① 可以试想一下：人类发展还处于原始时期，应该说原始共同体之间的战争与威胁并不存在多少技术代差，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威胁已经存在非常大的技术代差。这就意味着，一个落后国家翻身解放要比一个原始共同体还困难得多。

② 1952年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偷窃经济情报的斗争就是一次“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的斗争，由此可见阶级矛盾的制约作用。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24：47）。

③ 萧冬连（2014：40）认为：“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安排（即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引者注）并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即使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也很难证明一定要消灭一切私有产权。”本文认为，历史地看，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和物质极其短缺的情况下，个体化行动与集体化行动之间没有多少回旋空间之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有利于集中力量推进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即使有后发国家依靠私有产权发展重工业的例子，因为国情不同，也不能得出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不利于中国发展的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民族独立国家依靠自力更生为主，在亿级或十亿级人口规模基础上完成工业化形成体系化工业能力的国家只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展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团队化分工功不可没。

命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1953年，党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毛泽东，1999a：316）原计划过渡时期的时长为三个五年计划，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人民群众广泛地组织起来了，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覆盖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因此，在个别具体生产方式上，奠定了通过团队化分工把人民群众更快速、更广泛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

（二）大力发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团队化分工，奠定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坚实基础（1956—1978年）

1. 主要矛盾<sup>①</sup>与发展战略。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包括十分丰富的内容，如果再聚焦一些，其中，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提出的“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4：341）尤为突出。鉴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为了国家和民族安全，需要把大量的人、财、物投入重工业及国防工业的建设之中，即“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人、财、物内部积累需要农业支持，但是，农业生产还很落后，不能为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发展提供充分的粮油、棉花及其他原材料，以及资金积累，是为“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既要迅速建立保护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又要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任务十分紧迫与繁重，核心依靠是工业化。所以，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指出：“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4：

<sup>①</sup> 本文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个阶段表述社会主要矛盾。



341—342) 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依据。一方面,从安全出发,发展国防工业需要重工业来支撑;另一方面,从发展出发,农业、轻工业和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重工业提供生产资料。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所在,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支撑。因此,重工业优先发展是由社会主要矛盾及统筹发展和安全所决定的历史必然选择。当然,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是让其“单兵突进”,而是党领导人民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就是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重点的“四个现代化”战略。

2. 组织起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发展战略、薄弱的物质基础决定了个体化行动与集体化行动之间的矛盾张力仍然没有多少回旋与调和的空间,集体化行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个别具体的生产方式上只能大力发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团队化分工生产方式。

(1) 解决组织起来的人口数量与质量问题。人是“组织起来”的主体,只有达到一定的人口规模,通过“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才能形成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才可能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自主。这一时期,在资本极度短缺的情况下,进行以重工业建设为重点的“四个现代化”,需要人力来替代资本,克服资本短缺的掣肘。无论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设,还是交通运输、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事实上主要靠“人海战术”(一要数量)与“艰苦奋斗”(二要精神)。除了必要的机器设备外,其他如土建、房屋、道路等物质条件建设主要靠人力来完成。也就是说,20世纪50—70年代,我国一直发挥劳动力丰富的禀赋优势,通过劳动力替代资本的技术路线来发展重工业、国防工业、农田水利和铁路公路交通等基础工业与基础设施。<sup>①</sup> 既然

① 发挥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不能直接等同于发挥产业比较优势。由于产业产品的要素结构具有可变性,改革开放前发展重工业、国防工业以及铁路公路、农田水利等基础工业与基础设施,并非每个环节都天然资本密集型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劳动力替代资本的技术可能性。走劳动力替代资本的技术路线,恰恰符合我国当时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短缺的要素禀赋结构。所以,发展重工业并不等于没有发挥我国劳动力丰富的禀赋比较优势。相反,如果在当时发展重工业坚持走资本密集型的道路,恰恰违背了我国劳动力丰富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当然,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也可以反过来,如农田水利、铁路公路等基本建设,过去是劳动密集型的,而现在却成了资本密集型的。

要依靠更多的劳动力，那么就需要更多的出生人口。毛泽东同志在计划生育问题上，一是从长远看，认为人类自身的生产要有计划，提倡节育；二是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来看，认为人不仅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要乐观，不要悲观”；三是主张人口总量达到八亿人左右时再讲人口过多问题（向国成、湛亭颖、刘晶晶，2019）。同时，为了使高等教育更好地服务于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重点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需求，将私立高等学校公有化、对高等学校的院系及学科专业设置进行调整，大力发展人民医疗卫生体育事业，提高了我国人口素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到1978年，我国总人口快速增长到9.6亿人，人均预期寿命达到68岁，培养了千百万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

（2）发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团队化分工组织。1950年后苏联援助我国以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为主的156个工业化重点项目。这些工业化重点项目以及与之配套的大中型项目采取何种所有制形式呢？显然不可能拱手让与私有制企业发展，必然采取国家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形式，开启了全国工业化进程。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为了加快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大力发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国有企业与集体经济等团队化分工组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到1978年，人民公社数量是52781个，全民所有制农场有2067个，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工业企业单位数达到34.8万个；到1980年，人民公社社队企业数为142.5万个，商业餐饮业服务业机构数为236.9万个。实际上，整个国民经济从微观到宏观也是这样一种组织，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行计划调节机制。计划经济不过是以国家为单位的“第二类分工”组织，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sup>①</sup>

（3）“先锋队”在“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一种观点有意无意强调改革开放前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搞“共同贫穷”。如果还是这样一种理论认识，就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相抵触，那么，理论与历史、实践就无法真正统一。本文

<sup>①</sup> 希克斯（1987：24）指出：“在汤因比称之为‘挑战’的压力下，制度可能转向指令方向，但在缺乏挑战时则有一种惯性法则、一种社会引力起相反的作用。”也就是说，只要一定历史条件出现了，计划经济就可能为社会所选择。因此，不顾历史条件否定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不对的。同样，历史条件变化了，固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是不对的。

认为，在改革开放前，存在收入分配差距不大的情况，但不是平均主义。毛泽东（1999c：11、130）认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应实行这个原则，反对平均主义；他曾经提出“我们也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那么，如何看待当时收入分配差距不大的情况呢？由于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很低，而生产力水平提高又有一个发展过程，在物质普遍短缺的情况下，拉开收入差距，将导致更多人不能解决温饱问题，“不饿死人”的伦理原则要高于效率原则（向国成、谌亭颖、刘晶晶，2019）。尽管实行按劳分配，但收入分配差距不宜拉开太大。所以，毛泽东同志既讲物质激励，也强调精神鼓励。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红旗渠精神”“大庆精神”“航天精神”“劳模精神”等社会主义精神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等企业管理创新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先锋模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劳动者的积极性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激励下，在国民经济计划轨道上得到充分展现，开展了“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尤其是在国家长远计划和“先锋队”的引领下，开展了跨期的“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今天我们才能自豪地看到北斗卫星遨游于广袤宇宙。当然，也并不否认存在不能切实贯彻按劳分配而滑向平均分配的情况，但这不是那个时代的主流。主流是同甘共苦、艰苦奋斗！<sup>①</sup>只有这样来认识，前后历史才可能贯通，才可能统一起来。

（4）利用价值规律，有限发挥“第一类分工”即市场化分工组织的作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认真研究和深入思考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中国经济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重要的探索（吴易风，2013）。他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推动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陈晋，2013；顾海良，2020）。其中，他提出“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

<sup>①</sup> 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就讲到，关于产品分配，“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毛泽东，1999c：136）。

1999b: 435)。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毛泽东，1999c: 34）。他还正确地指出商品生产的性质取决于其联系的经济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毛泽东，1999b: 439）。应该说这是后来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源头。按照马克思“两类分工”的划分，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发展“第一类分工”，即市场化分工组织。也就是在公有制企业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建立市场联系，遵循价值规律，由市场来调节。

3. 经济发展一般机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相互促进的发展一般机制具有如下特点：（1）大力发展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团队化分工组织，快速把人民组织起来，开展“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sup>①</sup>（2）第一类分工即市场化分工组织发展与市场调节作用有限；（3）通过“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提高生产力水平，侧重于供给创造需求，也就是侧重从提高分工水平到提高生产力水平，再到扩大社会需求的发展。这一阶段，在“两类分工”中，为了解决有没有即生产什么的问题，重在发展团队化分工，为下一阶段市场化分工奠定基础。

4. 经济运行与发展格局。（1）主要通行计划调节机制，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2）鉴于内部独立自主的需要和外部经济封锁，根据国内需求，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在生产供给端解决有没有即生产什么的问题，重在培育和发展的内生能力与内生优势，形成了以国内分工为主要载体的内部经济循环格局。1952—1978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在10%以内。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重点的“四个现代化”战略，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培育我国经济内生优势的一次伟大实践（向国成、湛亭颖、刘晶晶，2019）。（3）市场化分工极不发达，团队化劳动分工发展在城乡和地区之间比较平衡，再加上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控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小。（4）高积累、高投资、低消费，完成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原始资本积累。（5）在不

<sup>①</sup> 正如文一（2016: 34）指出的，“教会他们如何组织自己的正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政府和一系列农村合作化运动”。

到30年的时间内进行了覆盖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农田水利与交通基础建设，初步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独立的工业与国民经济体系、国防体系和科学教育体系，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

毫无疑问，“组织起来”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团队化分工发展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动机，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奠定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坚实基础。

### （三）“两类分工”相互促进：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高速度发展（1978—2012年）

1. 主要矛盾与发展战略。由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以“两弹一星”、核潜艇为标志的巨大科技成就，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安全有了基本保障，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矛盾得到了缓和，发展与“富起来”的问题就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根据这一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党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为此，形成了以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

尽管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利于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但主要问题在于：（1）劳动者的活力在国民经济计划轨道之外很难得到体现，整个社会产品多样化发展不足；（2）市场化分工组织受到限制，市场调节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十分有限，生产规模主要按计划而不是按市场需求来确定，往往不能形成规模经济，导致生产潜力不能充分发挥；（3）不断提高的分工复杂程度，客观存在的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矛盾（蔡继明，2023：375），加之产品价值本身具有主观性、个体性、多元性和绝对变动性的属性，使得价值量离开当事主体难以由社会中心准确计量，导致计划规模边际成本存在递增趋势，即一旦计划规模越过一定点，计划的边际成本越来越高。由此决定了政府计划的范围与规模是有限的，需要发挥经济主体分散决策的作用，

计划经济需要转向市场经济。<sup>①</sup>此外，外部封锁导致我国经济只能被动进行内部循环，使得以大规模人口为基础的“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实施以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需要进行改革开放。

2. 组织起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发展战略决定了个体化行动与集体化行动之间的矛盾张力有了较大的回旋空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生产力发展为调和这对矛盾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

(1) 农业生产方式，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由集体经营转向家庭经营。这在一定意义上是由团队化分工生产方式转向家庭自给自足生产方式。随着对农业采取了缩小指令性计划、废除统购统销体制、实行价格“双轨制”、引导农民跨区域流动、放松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管制和允许土地协商转包等诸多改革措施实施，赋予了农民迁徙、就业、投资和生产经营的自由选择权，我国农民农业组织化形成了沿着人民公社→家庭经营→农业商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民团队化的演进主线。（向国成、韩绍凤，2007）整体来看，一方面，农民团队化分工生产方式与农民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并存；另一方面，从农产品到农业生产过程的市场化分工得到发展。大部分农民不同程度卷入市场化分工，但还有一部分农民由于产业缺乏和交易效率低不能有效开展市场化分工，这为后来的“精准扶贫”埋下了伏笔。

(2) 20世纪80、90年代，以“社队工业”为基础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文一（2016：31）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这种‘中国式’的农村工业化实质上与英国工业革命前夕发生在17—18世纪的欧洲大陆，尤其是英国的‘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浪潮一脉相承，具有相同的意义、机制和规

---

<sup>①</sup> 恩格斯在1844年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到了1878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仍然坚持这一见解，并指出：“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恩格斯，2018a：334）恩格斯没有详细解释《资本论》是怎样科学论证这一见解的，理论界后来也没有完全论证清楚，主要是从“两种必要劳动时间”来解释。向国成、韩绍凤（2002）基于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提出劳动价值结构论，论证恩格斯的这一见解，指出价值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社会性与个体性、一元性与多样性、相对静止性与绝对变动性的统一。这就决定了，一方面，一定程度的经济计划性是可行的，可以发挥集中计划决策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决定了计划的有限性，需要发挥市场分散决策的作用。

律。”这场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工业化浪潮引爆了以轻纺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2000年，乡镇企业数量从152万个增加到2085万个，从业人员数量从2827万人增加到12820万人，乡镇企业增加值从209亿元增加到27156亿元。乡镇企业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团队化分工组织和市场化分工组织的发展。

(3) 1984年开始，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及相应的团队化分工组织。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要矛盾及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化以及外部安全环境的改善，个体化行动与集体化行动的矛盾张力有了更大的回旋与调和空间，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主客观条件形成，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基础上的团队化分工组织蓬勃发展。

(4) 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大力发展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商品和要素市场体系，逐步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交易效率得以提高，市场化分工不断扩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5) 从兴办深圳等经济特区、开发开放浦东、推动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和内陆中心城市对外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挥劳动力禀赋比较优势以及后发优势，发展加工制造业，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扩展世界市场，进一步释放“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潜力。

(6) 完善政府计划。大幅度缩小政府计划的范围与规模，计划方式由指令性计划为主转向指导性计划为主。政府计划主要是主导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与重要产业发展，通过财政、货币和产业等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科学引导与调控，为全民提供社会保障与公共产品（包括经济秩序）服务。

3. 经济发展一般机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一般机制具有如下特点：(1) 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团队化分工组织；(2) 市场化分工得到大发展，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3) 侧重于从扩展市场和扩大需求，到进一步释放“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的潜力，再到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一般机制在不断成长。

4. 经济运行与发展格局。(1) 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形成政府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2) 主要依靠发挥劳动力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以及后发优势,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产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2008年外贸依存度达到66%,一度形成以国际经济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3) 团队化分工和市场化分工相互促进,推动了城镇化发展,城镇成为组织“两类分工”的主要载体。(4) 轻工业、城市化以及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发展,产生了对重工业的巨大市场需求,使我国重化工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迎来了第二次黄金发展时期,2010年我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完成了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5) 投资、消费和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6) 在相对具体生产方式上,劳动分工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在较大程度上卷入国内国际分工的群体,其收入增长较快,而不能卷入或卷入分工程度较低(即失业或自给自足程度较高)的群体,其收入增长较慢。<sup>①</sup> 在个别具体生产方式上,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与以非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并存,与之相适应,在分配机制上,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两个层次(亦即发展与分配)的结合共同推动了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毫无疑问,“两类分工”迅速成长,相互促进,在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中推进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高速度发展。

5. 理论反思。人民公社为什么可以转向家庭承包?生产力水平低、发展不平衡是不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依据?在已有对人民公社转向家庭承包的理论分析中,主要是从缺失剩余权利主体导致内生交易费用的角度进行分析(Lin, 1988; 周其仁, 1994)。家庭承包可以被视为没有内部分工的自给自足结构,即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天然不会产生内生交易费用,但是,也不能获得分工经济的好处。而人民公社是一个团队化分工结构,任何团队化组织都会产生内生交易费用,但可以获得分工经济的好处。只要人民公社的分工经济大于内生交易费用,仍然是有效率的。也就是说,对人民公社与家庭承包这两种生产方式的分析应该立足于分工经济与内生交易费用的矛盾,仅从内生交易费用角度分析人民公社转向家庭承包是不够的。人民公社把人民群众

<sup>①</sup> 斯密认为分工带来普遍富裕,马克思从发展过程来看,认为分工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将导致不平等,只有分工发展更加平衡更加充分,才会不断走向共同富裕。参见向国成、刘晶晶、罗曼怡(2022)。



组织起来，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农田水利改造，发展“五小工业”（小钢铁、小煤窑、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促进了农业的机械化、化学化发展，也增强了个体生存发展能力。过去由集体才能达到的农作物亩产量，后来家庭承包也可以达到。在农作物亩产基本等同的情况下，不产生内生交易费用的组织代替产生内生交易费用的组织具有经济合理性。但是，如果不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农田水利改造，不推进农业机械化、化学化的发展，或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仍然维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分散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行不行？舒尔茨（1987）认为仅仅局限于传统农业内部现存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对传统农业发展是徒劳的。由毛泽东同志亲自组织编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的176个案例对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分散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给出了否定答案。以粮食作物为例，在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下，1949年我国亩产仅有68.6千克，而经过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发展，粮食作物亩产不断提高，1952年为88.1千克，1957年为97.3千克，1965年为108.4千克，1970年为134.1千克，1975年为156.7千克，1978年为168.5千克，再到1982年转向家庭承包，达到208.3千克。<sup>①</sup>正是因为获得了新的生产力，个体生存发展能力绝对增强，人民公社转向家庭承包才没有降低农作物产量，甚至还有提高。因此，可以说正是人民公社发展了生产力，增强了个体生存发展能力，创造了在农业领域可以否定自身并转向家庭承包的物质基础。而始于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也成为瓦解公社（共同体）的重要力量，就像原始共同体被瓦解一样。但是，这里之所以说“人民公社可以转向家庭承包”，也意味着不是所有人民公社非转向家庭承包不可。因为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农工商综合体，“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的分工经济不仅仅体现在农业生产经营上，还体现在工商业的发展上，农工商综合体的分工经济往往要高于仅局限于农业领域的分工经济，这样就能大大削弱人民公社内生交易费用的制约作用。这一点为后来继续保留人民公社体制的华西村、周家庄、南街村、大寨村，以及全国乡镇企业的发展所证实。当一些地方家庭承包的农民困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个体生存发展能力相对不足而不能有效开展市场化分工时，再次通过集体经济的团队化分工生产方式

<sup>①</sup> 根据ESP数据平台的数据换算，四舍五入。1982年党中央以“中央一号文件”形式在全国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而开展市场化分工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

20世纪80年代,我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依据是生产力水平低、发展不平衡。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当个体生存发展能力严重不足,需要“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的时候,公有制是支撑集体行动的一种制度选择。因此,生产力水平低更可能是发展公有制的依据,而不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依据。<sup>①</sup>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私有制在生产力提高与分工发展过程中产生。正是经过改革开放前30年公有制经济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个体生存发展能力得到增强,导致个体化行动增强,形成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现实要求。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私有制“不是生产力落后的结果”(蔡继明,2023:48)。实际上,公有制和私有制是与一定生产力水平及环境相适应的个体生存发展能力绝对增强与个体生存发展能力相对不足(即个体化行动与集体化行动)的矛盾产物。根据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只有到了生产力水平提高到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的程度,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度发展,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完全统一,所有制上的“否定之否定”才会完全实现。因此,针对现阶段及今后较长历史时期的“民营经济退出论”是不成立的。

#### (四)“两类分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2012年至今)

1. 主要矛盾与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转化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但是,社会经济发展还在不同领域(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城乡、产业链、科学技术等多方面存在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同时,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和安全的矛盾再度紧张起来。前一阶段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增加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难度。例如,在高科技与产业链高端方面,

<sup>①</sup> 王宏甲(2021)介绍了生产力水平低的贫困地区如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山东省烟台市衣家村等重新走集体化道路的案例。这些案例说明,生产力水平低更可能是发展公有制的依据。

自主创新不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就很容易形成被人“卡脖子”的局面。无论是解决发展问题，还是解决安全问题，核心是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解决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在经济发展战略上，中国经济现代化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走高质量的发展道路，要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产业载体，要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雄厚的实体经济保障，大踏步赶上并引领时代发展。

2. 组织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与发展战略、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任务，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提供的“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共中央，2021：15），决定了个体化行动与集体化行动之间矛盾的协调有了更大回旋空间，并且通过高质量发展可以把个体化行动与集体化行动之间可能存在的此消彼长关系，转化为相互协同、相互促进的关系。

（1）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高质量发展团队化分工。一方面，推动国有企业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另一方面，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和政策支持，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从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方面，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全面落实公平竞争政策制度，完善社会信用激励约束机制、市场化重整机制和融资支持政策，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持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引导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支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支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总之，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优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充分激发民营经济生机活力，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2）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高质量发展市场化分工。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动完善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维护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健全统一的社会信用制度；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以升级流通网络、畅通信息交互、丰富平台功能为抓手，着力提高市场运行效率；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动建立健全统一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

资本市场、技术和数据市场、能源市场、生态环境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着力完善质量和标准体系；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以增强监管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为保障，着力提升监管效能。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推进市场化分工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有效市场作用。

(3)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发挥有为政府作用。我国经济发展已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阶段，传统要素优势逐步消失，经济发展需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美国对我国的“脱钩断链”背景下，“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遇到了关键科学技术的瓶颈以及由此产生的产业发展瓶颈，特别需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未来产业，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这就更需要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上，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打开发展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更好发挥了有为政府作用，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发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持续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承担与我国能力和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东部沿海地区持续发挥开放引领作用，加快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稳步发展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深入推进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通过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对外贸易和投资布局，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提升拓展了组织“全球资源、全球产业、全球市场”的能力。

3. 经济发展一般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相互促进的发展机制具有如下特点：（1）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团队化分工生产方式与以非公有制、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团队化分工生产方式协同发展、相互促进；（2）市场化分工高质量发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3）坚持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有机统一，坚持高质量团队化分工和高质量市场化分工相统一，坚持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相统一，形成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需求牵引供给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4. 经济运行与发展格局。（1）坚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更加科学发挥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相结合的互补优势。（2）坚持“厚植发展优势”（习近平：2017b：54），强化现有优势、挖掘潜在优势与发展新优势有机统一（习近平，2006：73），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3）在供给侧方面，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供给结构上实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政策措施，减少无效供给，提高有效供给；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分工与协同机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更安全、更高效的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需求链统一的产业生态组织系统，不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进而不断突破“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所遭遇的产业发展瓶颈，推进了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保持了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增强了制造业竞争优势，推动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以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新基建的建设进程，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了新质生产力发展。（4）在需求侧方面，一是深化国内国际市场范围。在国内，对老少边穷地区实施了为期10年的“精准扶贫”，发展了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产业扶贫和以交通通信网络为基础的市场扶贫，即团队化分工和市场化分工协同发展，把近1亿人口纳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历史性解决了贫困问题；在国际，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形成多元化的国际市场。二是推进共同富裕。紧紧围绕“提低、扩中、调高”，推动完善以市场为基础的初次分配制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

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的分配关系，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发挥好慈善组织在扶老、救孤、恤病、助残、扶贫、济困、优抚等方面的作用，推进了共同富裕进程。

毫无疑问，“两类分工”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在更加平衡更加充分发展中推进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总之，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中国经济现代化高速发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组织起来”内生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的经济发展机制，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实现机制，实现了经济的长期稳定与繁荣。

### （五）中国共产党始终是组织起来的核心力量

回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整幅画卷，今天我们能够更深刻地领会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真理和磅礴力量。在把人民组织起来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组织起来的核心力量。之所以能够把人民组织起来在较短时间内将我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最基本的因素有三条：（1）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把增进人民福祉始终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是组织起来的根本动力；（2）担当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实事求是，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矛盾、条件、目标与任务，制定相应的战略、路线、方针与政策，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制度、道路和文化体系，是组织起来的系统保障；（3）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每个时期形成了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培养了千百万优秀干部与先锋模范，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在组织起来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习近平（2014：118）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经过70多年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探索出了一条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和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共同作用于经济发展的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党+政府+市场’的稳定

结构”（周文，2023：226），实现了有力政党、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统一。

## 五、结语

本文在厘清分工范畴基本问题基础上，提出了以劳动为起点范畴，以劳动分工为中心范畴，以生产方式演化亦即劳动分工组织演化为纲的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主线，阐明了这一逻辑主线从高度抽象生产方式到相对具体生产方式，再到个别具体生产方式的三层解析逻辑。其中，相对具体生产方式，即劳动分工生产方式的发展内生了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一般机制；个别具体生产方式使得这一经济发展一般机制在不同社会形态中呈现特殊的经济运行与发展格局。本文遵循从生产方式到经济发展一般机制，再到经济运行与发展格局的演化主线，运用主要矛盾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进行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阐释。结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可以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进行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相统一的理论阐释，组织起来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动机，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实现机制，中国共产党始终是组织起来的核心力量。

1. 生产方式演化。与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主要矛盾及由此派生的经济发展战略，决定了个体化行动与集体化行动的矛盾张力，由此决定着相对具体生产方式、个别具体生产方式的选择。（1）相对具体生产方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新进程，在自给自足与劳动分工两种相对具体生产方式上，组织起来，开展“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是必由之路。组织起来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起点，与之对应，劳动分工是阐释中国现代化的理论逻辑起点，实现了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在起点上的统一。（2）个别具体生产方式。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及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决定了个体化行动和集体化行动的矛盾张力没有多少回旋与调和空间，集体化行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此决定了必须依靠国家政权，大力发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团队化分工，更快速更广泛地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主要矛盾及经

济发展战略适时转化。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及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战略决定了个体化行动与集体化行动之间的矛盾张力有了较大的回旋与调和空间，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及相应的团队化分工组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需要通过高质量发展协调个体化行动与集体化行动之间的矛盾，要把个体化行动与集体化行动之间可能存在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转化为相互协同、相互促进的关系，即高质量发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团队化分工生产方式和以非公有制、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团队化分工生产方式，使之协同发展、相互促进。

2. 经济发展一般机制演化。团队化分工和市场化分工这“两类分工”的发展及其相互促进，内生出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一般机制。(1)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重点解决团队化分工发展问题，通行计划调节机制。侧重从提高分工水平到提高生产力水平，再到扩大社会需求的发展，并为下一阶段市场化分工发展奠定基础。(2)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一方面，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及相应的团队化分工组织；另一方面，市场化分工组织得到发展，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两类分工”相互促进，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一般机制不断发育成长。侧重于从扩展市场和扩大需求，到进一步释放“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的潜力，再到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发展。(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团队化分工生产方式和以非公有制、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团队化分工生产方式；高质量发展市场化分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两类分工”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形成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需求牵引供给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一般机制更加成熟。(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组织起来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第二类分工（团队化分工）发展出发，经过第二类分工与第一类分工（市场化分工）的发展与相互促进，内生出了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一般机制，这仍然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从原始共同体第二类分工出发，经过“两类分工”的高度发展，最终迈向自由人联合体这一更高层次的第二类分工的历史大趋势，我们正处在“两类分工”还需要进一步高质量



发展的阶段。

3. 经济运行与发展格局演化。(1) 从主要依靠计划调节机制,到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的与“两类分工”组织相适应的计划和市场两类协调机制在实践中不断更好结合的发展过程,在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中实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稳定。(2) 从主要培育内生优势,到主要发挥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再到既强化现有优势、挖掘潜在优势,又自立自强自主创新发展新优势,是根据客观条件,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在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与比较优势辩证思想的过程,在融入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保证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独立自主。(3) 从侧重供给侧、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到侧重需求侧与扩展市场、一度形成以国际经济循环为主,再到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机制发育、成长和成熟的发展过程,实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繁荣。

4.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1) 特殊性。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组织起来的核心力量。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组织起来的根本动力;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制度、道路和文化体系,是组织起来的系统保障;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每个时期形成了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培养了千百万先锋模范,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在组织起来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实现了有力政党、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特殊性。(2) 普遍性。中国经济现代化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一般机制中逐步实现的。这是为数不多的、适合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体现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普适性。

总之,运用马克思主义广义政治经济学范式来阐释中国经济现代化,可以实现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中国经济现代化不经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阶段就不能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不能快速广泛地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开展“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从而就不能快速奠定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坚实基础;只有超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阶段而迈进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循环累积、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机制不断发育、成长和成熟，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高速度与高质量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是阐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创造人类经济发展奇迹和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理论武器。

### 参考文献：

- 贝克特，斯文，2019，《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徐轶杰、杨燕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 蔡继明主笔，2023，《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中信出版社。
- 陈晋，2013，《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和理论贡献》，《求是》第24期。
- 陈振中，2007，《青铜生产工具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崔向阳，2011，《马克思的历史视角分工发展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当代经济研究》第8期。
- 董辅初，1980，《关于生产力的几个问题》，载《经济研究》编辑部主编《论生产力》（下），吉林人民出版社。
- 恩格斯，2018a，《反杜林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 恩格斯，2018b，《自然辩证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 恩格斯，2018c，《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 樊纲，2019，《“发展悖论”与“发展要素”——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案例》，《经济学动态》第6期。
- 樊纲，2020，《“发展悖论”与发展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管理世界》第4期。
- 格申克龙，亚历山大，2012，《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
- 顾海良，2020，《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性研究——纪念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60周年》，《毛泽东研究》第4期。
- 赫希曼，阿尔伯特，1991，《经济发展战略》，潘照东、曹征海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 李根蟠，1983，《耦耕纵横谈》，《农史研究》第1期。
- 林岗，2007，《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 林毅夫，2012，《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张建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 刘伟, 2022,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特点的再讨论——学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体会》, 《政治经济学评论》第5期。
- 罗斯托, W. W., 2001, 《经济增长的阶段: 非共产党宣言》, 郭熙保、王松茂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马家驹、蔺子荣, 1980, 《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经济研究》第6期。
- 马克思, 2018a, 《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2018b, 《资本论(纪念版)》第2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2018c, 《哥达纲领批判》,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197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19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1998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1998b,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2012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2012b,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20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20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2018a, 《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2018b, 《共产党宣言》,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20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1991a，《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1991b，《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1991c，《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1996a，《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1996b，《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1999a，《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1999b，《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1999c，《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

孟捷，2016，《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诺思，道格拉斯，1994，《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诺思，道格拉斯、罗伯斯·托马斯，1999，《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

平心，1959，《再论生产力性质——关于生产力的二重性质的初步分析》，《学术月刊》第9期。

秦庆武，1983，《论分工的本质——兼与董田春同志商榷》，《求是学刊》第6期。

舒尔茨，西奥多，1987，《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商务印书馆。

舒尔茨，西奥多，2001，《报酬递增的源泉》，姚志勇、刘群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斯密，亚当，1972，《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上），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

王宏甲，2021，《走向乡村振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卫兴华，2014，《科学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研究中的唯物史观——兼评“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论”和“唯生产力标准论”》，《政治经济学报》第1期。

文一，2016，《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

吴易风，1997，《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吴易风，2013，《毛泽东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评论》第4期。

希克斯，约翰，1987，《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

习近平，2006，《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习近平，20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

习近平，2017a，《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 习近平, 2017b,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 外文出版社。
- 习近平, 2021,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中央文献出版社。
- 向国成、韩绍凤, 2002, 《劳动价值结构论》, 《求索》第2期。
- 向国成、韩绍凤, 2005, 《综合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理论的三大转变——超边际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 《财贸经济》第6期。
- 向国成、韩绍凤, 2007, 《分工与农业组织化演进: 基于间接定价理论模型的分析》, 《经济学(季刊)》第2期。
- 向国成、刘晶晶, 2020, 《论劳动分工改变比较优势格局及政府作用——马克思的“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思想与“双循环”》, 《社会科学》第11期。
- 向国成、湛亭颖、刘晶晶, 2019, 《基于“两个不能否定”深化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认识》,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向国成、刘晶晶、罗曼怡, 2021, 《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与市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经济学动态》第9期。
- 萧冬连, 2014, 《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谢富胜, 2023, 《中国道路的政治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谢富胜、李安, 2009, 《分工动态与市场规模扩展——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马克思主义研究》第9期。
- 许涤新, 1954a, 《广义政治经济学》第1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许涤新, 1954b, 《广义政治经济学》第2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许涤新, 1954c, 《广义政治经济学》第3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杨虎涛、刘方, 2019, 《理解中国模式——国家能力视角》, 《政治经济学报》第3期。
- 杨小凯, 1998, 《经济学原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杨小凯, 2003, 《经济学: 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杨小凯、张永生, 2001, 《新贸易理论、比较利益理论及其经验研究的新成果: 文献综述》, 《经济学(季刊)》第1期。
- 姚开建, 2019, 《广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生产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张培刚、张建华, 2009, 《发展经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张闻天, 1979, 《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 《经济研究》第10期。
- 张永生, 2003, 《厂商规模无相关: 理论与经验证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中共中央, 202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人民出版社。
-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202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4,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2013,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1卷, 中央文献出

出版社。

- 周其仁, 1994, 《中国农村改革: 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夏季卷。
- 周文, 2023, 《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程》, 商务印书馆。
- 周文、包炜杰, 20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 Arrow, Kenneth J. 1962.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9 (3): 155 - 173.
- Desmet, Klaus, and Stephen L. Parente. 2012. "The Evolution of Markets and the Revolution of Industry: A Unified Theory of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7: 205 - 234.
- Hanson, Gary D., and Edward C. Prescott. 2002. "Malthus to Solow."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 (4): 1205 - 1217.
- Lin, Justin Y. 1988. "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China's Agricultural Reform: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6 (3): S199 - S224.
- Lucas, Robert E.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1): 3 - 42.
- Prebisch, Raúl. 1950.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ffairs.
- Rosenstein-Rodan, Paul N. 1943. "Problems of Industrialis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Economic Journal* 53 (210/211): 202 - 211.
- Romer, Paul M.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5): 1002 - 1037.
- Schultz, Theodore W. 1961.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1): 1 - 17.
- Singer, Hans W. 1950. "The Distribution of Gain between Investing and Borrowing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0 (2): 473 - 485.
- Solow, Robert M. 1957.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9 (3): 312 - 320.
- Young, Allyn A. 1928.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Economic Journal* 38 (152): 527 - 542.

##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Based on Marxist General Political Economy

*Xiang Guocheng<sup>a,b</sup>, Liu Jingjing<sup>a,c</sup> and Yang Yuxuan<sup>a,b</sup>*

(Xi Jinping Economic Thought Research Center,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sup>a</sup>;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sup>b</sup>;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sup>c</sup>)

**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s a crucial component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unity of theoretical logic, histor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th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s not only a political requirement, but also a higher scientific demand.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some basic issues of division of labor,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Marxist general political economy logic that starts with labor as the initial category, centers on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takes the evolution of production modes, that is, the organiza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as the main thread. It clarifies the three-layer analytical logic from highly abstract production modes to relatively specific production modes, and then to individual specific production modes.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vely specific production modes, namely the division of labor production modes, generates a general mechanis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t involves the cyclical accumulation and mutual promo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development and market expansion; Individual specific production modes lead to this general mechanis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xhibiting unique patterns of economic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social formations. Following the evolutionary mainline from modes of production to general mechanis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n to patterns of economic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employs the main contradiction analysis method to provide a Marxist gener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Economically, "Organizing the whole people" mainly refer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mutual promotion of team-based

and market-oriented division of labor organizations as discussed by Marx. “Organizing the whole people” (meaning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of team-based division of labor) is the engine of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the starting point of historical logic,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oretical logic for explaining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Both share the same essence, thus achieving the unity of theoretical logic and historical logic at the starting point. “Organizing the whole people”, namely the development and mutual promotion of “two types of division of labor”, gives rise to the general mechanis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t Marx and Engels first and most comprehensively discussed, characterized by the cyclical accumulation and mutual promo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development and market expansion, promoting the high-speed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Therefore, applying the Marxist paradigm of general political economics can provide a unifi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logic, histor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of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Organizing the whole people” is both the engine and the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The CPC has always been the core force of organizing.

**Keywords:** Marxist General Political Economy, Organizational Economy,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B14, B24, P30

(责任编辑: 何 伟)